口述

我家的蝴蝶牌缝纫机

作者家的缝纫机

□ 耿仁国

43年前，一台缝纫机，犹如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带着爱与期待，飞进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十里井村，降临在我们家。

1981年秋，在南京长江港务局工作的大姨，帮我家买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在南京火车站通过火车货运，邮到了济南火车站。那时，还没有手机，电话也只有公社邮电局才有，通讯联系大部分靠信件。

那天中午，父亲母亲正在家里吃饭，公社邮递员骑着绿色邮政自行车到了我家门口，给我家送来一封电报。电报上说，大姨给我家购买的缝纫机已到济南火车站，叫我家人去济南取来。一家人非常高兴，决定让父亲去济南。

当时，交通还不发达，阳谷到济南的客车刚刚开通，每天仅有一班。父亲便决定骑自行车去济南。

那时，我家还没有自行车，村里有自行车的也没几家。村东张会计跟父亲关系不错，他家有一辆刚买不久的金鹿牌大轮自行车。父亲带了包大前门香烟，赔着笑脸，到张会计家借来了自行车。他准备好了钱和粮票，在自行车车把上挂上他那个黑色大提包，里边装上手电筒、捆绑缝纫机的绳子等。次日一早，父亲满怀希望，踏上了前往济南的路途。那时的他，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期待与憧憬。

我们家到济南约有二百公里的路程。那时的道路大多没有硬化，都是土路，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探险。他沿着土路，往东北方向骑行，先到阿城镇，后在东阿县城东过了黄河大桥，直奔济南。他一路感受着秋天的气息，欣赏着沿途的风景。虽然道路难走，但他心中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因为他知道，那台缝纫机将为家庭带来便捷与欢乐。

到达平阴县城的时候，正好遇到唱戏的，父亲在那里看戏，休息了一会儿。他走进路边一家国营饭店，交上钱和粮票，吃了顿饭。饭后他继续前行，在天黑之前进了济南城。

父亲从段店往里，边走边问，终于打听到了济南火车站的位置，可是到了那里以后，火车站的工人已经下班了。找不到人，父亲只好找了一个地方席地而坐。因为怕人偷自行车，他搂着自行车睡了一夜。

天亮了，父亲到火车站货场，找到了负责人，说明了情况。那位工作人员非常负责、非常热情，帮父亲在货场里找到了缝纫机包装箱，箱子上面贴着标签，里边就是从南京火车站发来的缝纫机。

工作人员问父亲，你带手续了吗？

父亲不知道要什么手续，说没有。

工作人员说，你没有任何手续，我没法给你，这样吧，你回去，到大队上开一封介绍信，再来取吧。

父亲无奈，叫那位工作人员写了介绍信的样式，放进提包里，骑着自行车从济南返回。

回来路上，父亲历尽艰辛。虽是秋日，太阳还是炽烈如火，他一路骑行，汗流浃背，口渴难耐。他曾在路过小村庄时，到户家讨水喝；曾在路边卖水小摊上买水喝；还曾在路边的水井里，自己打水喝……

走到东阿县城东边山路上时，不知什么原因，自行车后胎没气了，父亲只好推着前行。走了七八里路，到达一个小镇，费尽周折，找到了一家修自行车的铺子，人家一看，原来是后胎扎进了一个小铁屑。父亲叫人家补了胎，然后小心谨慎地骑行，终于回到了家。

回到家后，张会计正好有事，需要自行车，父亲就把自行车还给了他。

父亲找到大队书记，让他开了一封介绍信。稳妥起见，大队书记去公社开会的时候，又让公社加盖了一个公社公章。

但是，张会计家的自行车不能再借了，怎么办呢？父亲找到一个亲戚，说明了情况，好说歹说，借了人家的自行车，做好了第二天再去济南的准备。

夜里，明月皎洁，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钟表，不知具体时间。父亲看院子里非常明亮，以为是天亮了，就赶紧起床，洗漱完毕，带上介绍信，骑上自行车又出发了。

因为上一次走了一趟，这次，路上顺利多了。

父亲经阿城到了东阿县城，往东过了黄河大桥，进入平阴县城，又到长清，然后到了济南段店，再到济南火车站货场。工作人员收了介绍信，把缝纫机包装箱交给了父亲。

取到缝纫机包装箱，父亲如获至宝，把箱子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向人家道了谢，就赶紧往家走。

出了济南，骑行在一道道山梁上，山路弯弯，父亲的心情特别愉快，特别舒畅。

到达长清县城的时候，天黑了，父亲决定不再走夜路了。

月亮升起来，父亲找了一个宾馆住下。在宾馆里，他交上粮票和钱，美美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好好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父亲就赶紧起床，又出发了。走到黄河边的时候，一轮红日才冒出头。

下午，父亲终于回到家了，虽然疲惫，但精神抖擞。那一刻，全家人都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新生活的曙光。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打开包装箱，一台崭新的蝴蝶牌缝纫机展现在眼前。

父亲按照说明书，把缝纫机安装好，脚踩踏板试了试，非常好用。村里人听说了，纷纷来看，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自从我家有了这台缝纫机，母亲给我们缝制衣服就方便多了，它工作起来，仿佛一只真正的蝴蝶在翩翩起舞，用它缝制的衣服针脚细密，线条流畅。它不仅为母亲分担了繁重的家务，更成为我们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给我们带来无尽的便利和欢乐。

如今，四十余载已过，那台缝纫机虽然不再常用，但父亲依然将其视为珍宝。他时常擦拭它，仿佛在向它诉说那些过去的故事。年逾七旬的父亲说，这台缝纫机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要把它永久珍藏，一代代传下去。

（图片由作者提供）

头牯棚

□ 李祥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一般一个村或几个村叫作一个大队，大队根据人数下设若干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用土墙围起来、木栅栏当门的大院子，院子里有队里存放粮食和生产工具的仓库，有喂牛、驴、马、骡等牲口的棚子。牲口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需要集中在一起饲养，由专人负责。在鲁西地区，因为当地方言把“牲口”叫“头牯”，所以这个饲养牲口的地方也叫“头牯棚”，专门负责喂牲口的人，叫“饲养员”。

生产队犁地、播种、里拉外运，都离不开牲口，条件好的队喂养骡、马，条件一般的队喂养牛、驴。头牯棚往往是一拉溜的土房子，一般有六七间，里边是通着的，只有靠边的是单间。大通房子里面垒着两溜牛槽，牛槽旁边的木柱和上方的横木都是拴牲口用的。牲口干完一天活，被拴在槽上，吃草料、休息。平时没有活，天气又好时，饲养员会把牲口牵到院子里，拴在栏杆上，让它们晒晒太阳。

饲养员是个好差使，劳动强度不大，但是能挣全工分。社员要在地里劳动，阴天下雨不能出工的时候，工分是挣不全的；而饲养员不管什么时候都得照顾牲口，所以能挣一年的全工分。

那时没有高压电，更没有电视机，每户只有一个广播喇叭，晚上照明也是靠一盏煤油灯，但晚上也不舍得长时间点着。而饲养员在头牯棚里值班，可以点生产队里的灯。于是，吃完晚饭后，女人们点一会儿灯刷完锅，纳会儿鞋底子便休息了，男人们就三五成群地到头牯棚里找饲养员拉呱。他们盘坐在饲养员的大炕上，一拉就是大半夜，可以扯东家、道西家，可以拉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也可以互相开玩笑，甚至可以讲几段荤段子。特别是到了冬天，家里的炕没有柴火烧，可是头牯棚里有生产队里的柴火，饲养员的炕烧得很热，有的人拉呱拉困了就和饲养员在一起睡。人多了炕上睡不开，有的人便在院子里的麦秸垛上掏个洞，钻到里面睡到大天亮。时间长了，头牯棚便成了人们夜间主要的聚会场所。

当然，头牯棚不光是大人们的聚会场所，也是孩子们理想的乐园。他们在院子里玩“藏猫根儿”（捉迷藏）等游戏，院子大，麦秸垛多，又有大人们掏的洞，所以易藏难找。孩子们往往跑得满头大汗也找不到藏起来的小伙伴。有时候找了很长时间还是找不到，小伙伴们便失去了耐性，大人一喊就回家睡觉去了，而藏起来的小伙伴便在洞里睡着了。

等到下雪天，小鸟（主要是麻雀）无处觅食，便聚集在院子里的柴火垛旁寻找草虫或粮食粒。孩子们扫出一块空地，把喂牲口用的筛子扣在空地上，用拴着细绳的小木棍斜撑起筛子的一边儿，在筛子底下撒些粮食，然后牵着绳子的另一头，在远处隐蔽起来，屏住呼吸，握紧绳头，紧盯筛子，一旦发现小鸟飞进筛子底下觅食，猛地一拉绳子，筛子便扣在地上罩住小鸟。运气好的话一次能捉住好几只。孩子们在小鸟的腿上拴一根细绳，牵着满院子跑，玩够了再放飞。虽然麻雀是“四害”之一，但孩子们仍然不舍得伤害它们。他们虽贪玩、好玩，心却是善良的。

光阴荏苒，社会变迁，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头牯棚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在广大村民心中留下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

（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